

卷三導論¹

《吳耀宗全集》卷三收錄了1942至1949年間吳耀宗的著作（出版及未刊），呈現其自抗戰後期、國共內戰以迄中共建國之初的思想狀況。

在「大後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全面淪陷，吳耀宗無法回到上海，於是便在成都居住，直至抗戰勝利。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以重慶為陪都，大量難民自淪陷區湧至西南國統區的「大後方」，許多教育及文化機構也相繼內遷。太平洋戰爭後，原在上海「孤島」的基督教全國機構（如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青年會全國協會等）紛紛遷至「大後方」。昆明、成都、重慶等地成為抗戰

1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以下三篇拙文：（一）〈吳耀宗的生平、思想與時代〉，吳耀宗著，邢福增編注：《黑暗與光明》（新北市：橄欖，2012），頁xxx-xxxvi；（二）〈「愛國」與「愛教」——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對政教關係的理解〉，邢福增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1），頁476-494；（三）〈導論〉，吳耀宗著，邢福增編注：《社會福音／沒有人看見過上帝》（新北市：橄欖，2016），頁xliv-lxvii。

期間基督教事業的重心。²

鑑於成都聚集了不少基督教出版機構，於是，在吳耀宗發起及推動下，華英書局、廣學會、青年協會書局及《田家》半月刊於1942年9月達成協議，組成「基督教聯合出版社」，今後各單位出版及發行均以聯合出版社名義作統籌。至於各出版社在神學及對社會問題不同見解的差異，則本著互相尊重的辦法處理。³在抗戰後期，基督教聯合出版社對基督教文字工作有重大的貢獻。⁴1943年2月，《基督教叢刊》創刊號出版，是聯合出版社成立後創辦的季刊。1945年2月，《天風》週刊在成都出版。抗戰後期吳耀宗不少述著，都刊在這兩份刊物內。值得留意，吳耀宗為《天風》的編輯方針定下「開放」的原則，不避諱政治問題，宗教比重不大，成為國統區內罕有立場鮮明的教會刊物。⁵

在成都期間，吳耀宗住在美國浸禮會（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費爾樸（Dryden L. Phelps）的家裏。費氏自1925年起即在成都工作，主要在華西協合大學任教。費氏熱衷於「耶穌研究」，在其推動下，吳耀宗與金陵女子大學的劉開榮合譯了夏爾孟（Henry B. Sharman）編的《為人師的耶穌》（*Jesus as Teacher*）。⁶1945年2月，他遷居至同樣任教於華西大學的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James G.

2 Yi-fang Wu and Frank W. Price, eds. *China Rediscovered Her West: A Symposium*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40).

3 吳耀宗：〈基督教聯合出版社成立經過〉，《基督教叢刊》創刊號（1943年2月），頁3。

4 Herbert Hoi-lap Ho,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Operations and Trends*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 1988), 143-146. 另陳建明：〈抗戰時期基督教在華西的文字事工〉，《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科版）》（2006年3期），頁104-106。

5 董寶光：〈吳耀宗和《天風》周刊的主編們〉，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輯5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215-231。

6 夏爾孟（Henry B. Sharman）著，吳耀宗、劉開榮譯：《為人師的耶穌》（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

Endicott) 的家，成爲「親密的朋友」。⁷ 費氏及文氏被視爲支持民主的「進步教授」，與吳可謂惺惺相惜。他們的住所更被許多學生譽爲「民主之家」。⁸ 當時，華西大學所在的華西壩，成爲吳氏成都生活的主要活動範圍。抗戰時期，華西壩內共有五所大學（除華西協合大學外，尚有中央大學醫學院、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及燕京大學），是「大後方」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集中的地方。雖然身處「大後方」，卻無礙他們對局勢的關注。吳也積極參與各種學生團契的活動，並與青年學生一同討論時局，建立了密切的關係。⁹

《沒有人看見過上帝》

廁身在「大後方」的吳耀宗，仍然積極反省基督教如何回應時代的洗禮。期間他最重要思考成果，就是出版《沒有人看見過上帝》。

1943年8月6日，吳耀宗完成了長達5萬字的長文〈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刊於《基督教叢刊》第4期。由於吳氏患有目疾關係，整個寫作的過程「時作時輟」，前後用了近半年的時間，最後要由他口述，三位朋友筆錄始能完稿。吳耀宗對該書有極大的期望，在〈後記〉裏指出，「寫這本小書的意念存在我的心中，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又將之視作未來要完成一本比較長篇而有系統的著作——《甚麼是基督教》的「前奏或縮影」。¹⁰ 雖然這本「長篇」最後並沒有完成，但同年底《沒有人看見

7 文幼章：〈深切懷念我親密的朋友吳耀宗〉，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編：《回憶吳耀宗先生》（上海：該會，1982），頁138-141。

8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89），頁40-41。

9 計瑞蘭：〈懷念「松樹伯伯」——回憶吳耀宗先生在成都時的幾件事〉、張煜：〈懷念吳耀宗老師〉，兩文收《回憶吳耀宗先生》，頁146-158。

10 吳耀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基督教叢刊》期4（1943年11月），頁43。

過上帝》即由基督教聯合出版社在成都出版單行本。1944年及1946年，先後在成都（第三版）及上海重印（第四版）。1948年，他針對不少意見，對內容作了一些修改，是為第五版（增訂本），後又於1950年重印（第六版）。¹¹

關於此書的寫作緣由，吳耀宗在〈後記〉裏這樣交代：

在我信仰基督教不久以後，國內就發生劇烈的反宗教運動。反教的立場，有的是根據科學的思想，有的是根據唯物論，有的是根據西洋哲學或中國文化。這些反對宗教的理論逼着我，使我對我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加以一番嚴格的檢討。同時我工作的對象，又是一般被新思潮所激盪的深思好學的青年。我每逢對他們討論宗教的時候，他們都提出許多問題來，而尤其普遍的就是上帝的存在問題。我為這個問題，曾經用過一番思想，也在若干方面，作過一些研究，然而我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大概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我對我所苦思着的題目，忽然得到一點光明，這光明不但使我對上帝的問題得到一個滿意的解決，也使我對一般的宗教問題，得到一個新的啟示。我心中覺得非常快樂，就在當時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出版的《微音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信仰的新大陸〉，把我自己所發見的比於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現在看來，這未免有點比擬不倫，但把它當作是描寫我當時內心感覺的一種說法，這也許是可以原諒的。我對於自己所尋找到的不敢自信，因為恐怕我會陷於把幾種不同的思想調和起來的危險。若是這樣，我所得到的答案，即使主觀上使我感覺滿

11 吳耀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成都：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3）。吳耀宗：〈四版序〉、〈五版序〉，氏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五版（上海：青年協會，1948年10月），頁1-4。

意，也許客觀上，它已經遠離傳統基督教信仰的正軌，失掉它所遺留給我們的精華。因此，這本小書，與其說是提供甚麼成熟的意見，毋寧說是我把自己的宗教思想上和信仰上的一點探險，向讀者領教。¹²

正如他在文中開首時說：「上帝的信仰是必須經過一番深刻的，理智的，洗煉的。」「把上帝信仰裏面那些建立在真理和事實上的成份吸收出來，提煉出來，將那些想入非非，玄之又玄，完全往幻想中產生出來的成份摒除掉，揚棄掉，這應當是今天基督教運動的一個急務」。¹³他深信，他自己曾經歷的信仰掙扎，也是許多青年學生所面對的，故他期望將自己對「探險」的體會跟知識青年分享。他在〈四版序〉中清楚表明，本書的對象是「廿幾年來，我所接觸過的基督教內外的知識青年」，他們對基督教產生許多的疑問，特別是從理智範圍去面對上帝的存在。「如果不在理智方面，給他們一個滿意的解答，這些問題，就會變成他們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絆腳石」。《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無疑是「著者自己的信仰趨向」，但也是爲了「他所選擇的讀者對象」。¹⁴

抑有進者，《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除了承繼吳氏一貫的探索方向外，更反映出他關注的另一個時代議題——社會革命與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其與基督教的關係。據吳氏自述，自三十年代開始，他「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成爲其思想的重大轉變。¹⁵吳耀宗面對着唯愛革命的「理論」如何在現實中國「實

12 吳耀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頁43。〈信仰的新大陸〉一文，原文發表日期為1930年，刊於《微音》卷2期2。此處1934年有誤。

13 吳耀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頁7-8。

14 吳耀宗：〈四版序〉，《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頁2-3。

15 吳耀宗：〈一個基督徒的自白——基督教與唯物論〉，《天風》期102（1947年12月17日），頁4。

踐」的張力，期望能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作「思想調和」。而《沒有人看見過上帝》正是為這種「調和」置於「基督教信仰的正軌」的努力，並闡釋他對這具爭議性的問題的立場。其中第三章（第五版改為第二章）專門處理「上帝的信仰與唯物論」，是全書八章中篇幅最長的一章（其他各章也有論及唯物論）。顯然，吳氏十分重視這個問題：

從五四以來，尤其是九一八以後，唯物論對於中國的知識青年，有了一個很深刻的影響。唯物論是否定宗教的，因此也是否定上帝的信仰的。但我覺得唯物論與上帝的信仰，並沒有甚麼基本的衝突，在某些方面，反而可以互相補充，所以必須把我對這問題的意見發表出來。¹⁶

可以說，本書通過探討上帝信仰的存在，進而在理論層面，調和上帝信仰與唯物論間的關係。綜觀吳耀宗多部著作，大多數均以論文結集的形式出版，較系統性的專著，就只有《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堪稱其神學思想的代表性著作。¹⁷

調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的書名，令不少人誤會以為這是以約翰福音為文本，來討論耶穌基督所表現的上帝。但吳耀宗要處理的，其實是「上帝存在」的問題。「許多人懷疑上帝是看不見的，而我要指出來的，只是：看不見的上帝，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上帝。」不過，吳並不純粹是

16 吳耀宗：〈四版序〉，《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頁3。

17 吳宗素：〈落花有意，留水無情——我所知道的父親〉，邢福增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頁528-532。

對舊有的神學問題提出新的論證，而是在根本上建立一套「獨創的理論」，¹⁸ 即藉探討上帝的存在，進而處理上帝信仰與唯物論的關係。

首先，他要建構一套「科學的上帝觀」，目的是要說明「上帝是存在的」，而「他的存在不需證明」。因為上帝只是一個「名詞」，用來代表宇宙裏客觀存在的許多複雜的現象、事實和規律。「你可以否認上帝這個名詞，但你不能否認這個名詞所代表的事實」。¹⁹

職是之故，他認為不相信宗教的社會革命家，跟宗教信仰的分別，僅在於各自按着不同的力量（「辯證法」或「上帝」），來面對宇宙與人生。社會革命家相信革命是必定會成功的，因為他認定社會變革背後的歷史必然性。「表面上這似乎和宗教的見解完全不同，但實際上，這二者的〔均〕相信宇宙間有一種力量，按照一定的法則來鎔鑄歷史，引導人生，卻是一樣的」。²⁰ 正如吳在另一篇文章指出：「我始終相信，世界祇有一個共同的真理，這個真理並不是那一派學說或那一種主義所能獨占，所能專利的，而是任何人在任何時代都可以發見的」。²¹ 質言之，上帝信仰或唯物論，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個「真理」的發見。

在這套上帝信仰之下，吳耀宗再次處理基督教與共產主義間的異同問題。他認為，唯物論對客觀世界的看法，「只是一個橫的」，而基督教的上帝觀，卻是「把縱的和橫的看法聯繫起來」。從哲學的角度觀之，「縱」就是「存在」與「本體」（Being），而「橫」就是「演變」與「現象」（Becoming）：

18 吳耀宗：〈四版序〉，頁 2。

19 吳耀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頁 16。

20 同上，頁 12。

21 吳耀宗：〈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及其在大時代中的意義〉，吳耀宗編：《基督教與新中國》（上海：青年協會，1940），頁 268。

唯物論所注重的是變，是現象，是此時此地的世界。從它的觀點看，一切都是相對的，這是「橫」的看法。基督教卻把「縱」的和「橫」的聯繫起來。一切都在變，但一切都是根據着不變的法則和真理而變的。一切都是現象，但現象卻是本體的代表。此時此地，是我們生活的舞台，然而這個舞台，卻是建築在永恆的基礎上面的。²²

他認為，基督教神學上也有「超然」(transcendence)與「內在」(immanence)概念，表達人認為上帝在世界中存在的形式。「超然」旨在強調上帝與世界的分別，上帝的存有超乎萬物。「內在」則是指上帝不斷作用在世界之上，使世界得以繼續存在，所以上帝在世界之中存在。他認為，將上帝看作「內在於前萬物之中的原則，或真理」，就是泛神論的上帝觀和唯物論的宇宙觀。而基督教的上帝觀，卻是把上帝看作是「內在的，同時又是超然的」。²³

因此，吳氏指出，上帝的信仰與唯物論沒有衝突，因為兩者均承認宇宙萬物是客觀的存在着的，是可以科學方法體驗的。但他重申，「上帝的信仰不是唯物論，因為它在唯物論的宇宙觀上，加上了一點東西——把貫徹着宇宙萬物的客觀真理一元化，情感化，人格化，稱之曰上帝，把上帝當作一個指導和支持生活的力量。」²⁴

那麼，上述關於上帝的信仰與唯物論的不同，對於人的生活，特別是吳氏關心的社會革命事業，會帶來怎樣不同的作用？吳指出，「因為唯物論者對於一切事情的看法都是相對的。所以它就把此時此地或歷史某一階段的演變或需要，看成是絕對的。」當唯物論者把革命的任務看

22 吳耀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頁 18-20。

23 同上，頁 19。

24 同上，頁 20。

作絕對時，就會把「人」的價值與地位看作「相對」。相反，基督教把人視作「上帝的兒女」，「每一個人都有他本身的價值，都是一個『目的』，而不是應當被用來達到任何有價值的社會目的的工具。」即使在社會變革的時期中，被認為是反動的人也具有同樣的價值。唯物論者「把相對的東西看成是絕對的，所以它就無所謂謙卑和容忍」，而基督教「把一切的東西看成是相對的而同時又是絕對的」，便能避免這種偏差。²⁵

吳耀宗進而指出，唯物論者與基督教對人的不同態度，各自有其優劣。基督教對人抱着謙卑與容忍，很容易因為「永恆」而忘了現實，因為絕對而輕視相對。「因為某一個人的本身價值而妨礙了整個社會應有的進展」。相反，只注重整體社會的發展，卻往往出現忽視人本身價值的可能。針對社會革命的問題，基督教對某一階段的變革與改進，將之視作「無限可能的改進的點滴」，「能夠把事情看得恰如其份，永遠保持它的視線所應當有的各方面的景象——（Perspective）。」但其壞處卻是，「永遠拿絕對的東西來衡量目前相對的東西，而對於相對的東西，給予一個過低的估值。」基督教的唯愛主義，便很能說明這種問題：唯愛主義者認為人類最高的理想是愛，因而對一切足以改進社會，卻違反「愛」的原則的行動，都加以反對。²⁶

吳耀宗在《沒有人看見過上帝》裏對基督教與唯物論的探討，有何獨特之處呢？筆者以為，他主要的關懷，並不僅是論證上帝的信仰與唯物論沒有衝突，而是進一步地把唯物論包括在其建構的上帝信仰之內。正如他說：「一個信仰上帝的人，同時也可以相信唯物論」。他更期望，唯物論者也可以接受他所闡釋的上帝的信仰。²⁷此外，吳氏對唯物論只有橫的看法，而基督教兼有縱的看法的闡釋，事實上反映他企圖把唯物論包括在上帝的信仰之內。雖然他也有表達對基督教的批評，但在對比兩

25 同上，頁 21。

26 同上，頁 22。

27 同上，頁 22-23。

者的異同時，基督教的特殊貢獻，仍是他所重視及堅持的。²⁸ 當然，吳氏明白，這些立場，「對於一個正統派的唯物論者和一個正統派的宗教信仰徒，同樣是一個荒謬絕倫的異端」。²⁹

與中共黨員的交往

吳耀宗不僅在理論上完成了對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探索，也在實踐上跟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了更進一步的聯繫。

早於 1938 年 5 月及 1941 年 12 月，他分別在漢口及重慶跟周恩來見面。³⁰ 及至 1943 年 5 月 25 日，吳、周兩人作第三次交流。這時，正好是吳耀宗撰寫《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第一版的時間，會面地點是重慶曾家岩周公館，除了周、吳二人外，尚有董必武等三位中共「同志」。當時吳跟周表達了自己對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見解，指出兩者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點，但在某些根本問題上有分歧；但無關緊要，最後還是可以一致的。周恩來聽後，即坦率地表示，不能同意這種看法，但指出：「不同的世界觀並不妨礙我們爲了爭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來爲抗日和民族事業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這樣艱難的條件下，對每個人都是考驗，希望我們能繼續合作，在即將到來的新時期中爲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中午，周恩來更邀請吳一起午飯，並在飯後繼續交流。周恩來跟吳提及中共的黨史：「中國共產黨對馬列主義的認識也有個發展的過程，共產黨人也犯過很多的錯誤，但能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得到進

28 吳耀宗在最後從八方面探討上帝的信仰對生活的意義，如使人生既入世又出世；使人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善意的世界；給人一個廣大無邊的愛心；使人不斷追求真理；使人成爲大勇者；使人謙卑；使人對自然有更深切的欣賞；使人有不可言喻的平安。吳耀宗：〈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頁 33-37。

29 同上，頁 12。

30 邢福增：〈導論〉，《吳耀宗全集》，卷二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liii。

步。但願我們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問題，就對黨喪失信心。」³¹ 吳向周表達的立場，正是《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的觀點，周恩來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因為兩者根本在世界觀上截然不同，無法調和。這並非周、吳兩人首次見面，顯然，周恩來得悉吳耀宗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因而希望爭取團結吳氏。所以，周仍強調，儘管共產主義跟基督教有不同的世界觀，但並不妨礙信奉唯物論的中共黨員跟信仰基督教的吳耀宗合作。最後，吳耀宗請董必武開了一張學習馬列主義的書單給他，包括了《共產黨宣言》、《列寧傳》等五、六本書。³²

吳耀宗坦白指出，正統派的唯物論者不滿《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對唯物論的處理。1946年10月，他在〈四版序〉中提及，「有幾位讀者」對「上帝信仰與唯物論」特別表示不滿。他們認為「唯物論的弱點」，並不是唯物論本身的弱點，而是「應用唯物論者的弱點而已」。³³ 他並沒有交代這幾位讀者的背景，很大可能就是他認識的中共黨員。儘管其調和論不獲中共方面認同，但他仍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並深信這獨創理論的價值：

直到現在，我對那章書的說法，覺得沒有什麼需要修改的地方。我覺得，無論什麼思想系統，都各有它的注重點，因而就各有所偏；就容易使應用這種思想的人，有過與不及的毛病。在唯物論是如此，在基督教也是如此。³⁴

31 〈周總理與宗教事業及宗教界人士〉，載鄭毅濤編：《領袖·同志·良師·益友：廣交朋友周恩來》（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頁132。另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555。

32 孫志慧：〈周恩來與基督教領袖吳耀宗〉，《紅岩春秋》期1（2004年），頁14。

33 吳耀宗：〈四版序〉，頁3。

34 同上，頁3-4。

吳指的「那章書」，就是第二章「上帝的信仰與唯物論」。從全書的結構而言，如果吳氏企圖為上帝信仰建立理智基礎，刪掉這章，也不影響全書的立論。吳氏對這章的堅持，可見他在全書中對上帝觀的建構，實際上是要進一步建構其比較基督教與唯物論的理論框架。

與唯物論者的進一步辯論

在出版《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後，吳耀宗仍然持續探索這課題。他在1947年將〈基督教與唯物論——一個基督徒的自白〉投到非宗教性的《大學月刊》。〈基督教與唯物論〉一文觀點，基本上承繼了《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的看法。他在文末結論中總結道：

基督教和唯物論各有所偏，因而各是所有〔各有所是？〕，各有所短。基督教需要唯物論的長處，也可以補足唯物論的短處。同樣地，唯物論需要基督教的長處，也可以補足基督教的短處。舉一個例來說：以唯物論為根據的社會科學，可以使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得到更有效的表現，更科學的基礎。同樣的，基督教對於人的看法，關於人與人相處的道理，也可以使唯物史觀的社會革命理論，更顧念到它裏面人事的成份。³⁵

但他在文末引述了一件事，有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吳的想法。在1947年6月某天，吳出席一個餐會時，有人提及《沒有人看見過上帝》這書，在座的郭沫若馬上說：「我天天都看見上帝；人民是我的上帝。」對此，

35 吳耀宗：〈基督教與唯物論——一個基督徒的自白〉，《大學月刊》卷6期2（1947年7月），頁29。吳耀宗十分重視此文，後再刊於《天風》、《消息》，又收入《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增訂本及《黑暗與光明》。

吳氏一方面同意郭氏所言，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我們在人民裏面，固然可以看見上帝，上帝的真理，卻比人民所能表現的更偉大，更廣博」。³⁶上帝的「真理」大於「人民」，這正是吳氏對基督教信仰獨特性的信念。

1947年6月，中國正處於國共內戰之際，吳對於唯物論者「無知地、膚淺地否定一切宗教」之舉，感到惋惜。他期望能將基督教與唯物論建立「新的綜合與完成」，這樣，「在社會革命完成以後，耶穌的教訓，將會重新被人欣賞，被人寶貴」。³⁷他期望，基督徒不應「無知地，膚淺地，去排斥唯物論」，唯物論者同樣不應「無知地，膚淺地否定一切宗教」。³⁸

有趣的是，《大學月刊》的編者在載刊吳文的時候加了按語，指吳文採取的，是「形而上的觀點，不曾科學地正面處理問題的本質，卻只反映出一種純粹精神的探索歷程與觀念論的境界」，全文「反映了一種由苦悶到安慰的宗教情操，一種與時代共呼吸的精神交代」。編者形容，吳是「一位虔敬、誠懇、慈祥、進步的老人」在傾訴自己心底的一切，可見其「調和真理」的苦心。但是，編者卻指出：「真理是不可調和也不必調和的」，因為唯物論與宗教並沒有「相同的宇宙觀和真理觀」，唯物論者與宗教家都可以為自己的信念獻身，但兩者的「真理出發點並不彼此一致」，宗教家出於宗教情操，而唯物論者則出於科學的認識。「前者可以為了精神的安慰而不惜遷就唯物論，後者則必須爭取到物質世界的進步（包括人間關係在內）然後纔始心安理得。」這段按語，在欣賞吳耀宗的同時，也不禁流露了一種頗強的本位心態，對吳的「調和」作極大保留。在編者眼中，時僅五十四歲的吳耀宗，雖是「進步」，卻仍是一位徒具「苦心」的「老人」而已。不過，即或如此，這並不會妨礙雙方在共通點上成為相互信賴的朋友，這也是《大學月刊》願意刊登

36 同上，頁29。

37 同上。

38 同上。

吳文的原因。³⁹

1947年底，吳氏以〈一個基督徒的自白——基督教與唯物論〉為名，將文章轉載於基督教刊物《天風週刊》及《消息》。⁴⁰1948年1月下旬，《天風》刊登了一篇署名「李全」的文章，題為〈基督教與唯物論——另外一個基督徒的意見〉，對吳氏的觀點提出商榷。⁴¹雖然李全以基督徒自居，也表達了一些基督徒的疑問與關注，但綜觀全文所表達的立場，實際上更多從唯物論者的立場出發，故筆者有理由懷疑，「李全」及「基督徒」的身分，僅是掩飾的幌子而已，骨子裏其實是代表唯物論者來反駁吳氏。⁴²

「李全」認為，吳耀宗主張的調和，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希望」，既站在基督教所不承認的角度去「修改」基督教，又站在唯物論所不承認的角度去「修改」唯物論，結果是「絕對不成事情的」。問題主要在於，「在根本哲學上，基督教與唯物論是絕對無協調可能的，不是你對就是我對，絕無甚麼取短補長之理」。⁴³

「李全」的立論，其實是從唯物論本位出發，突顯共產主義與基督教間的根本矛盾（方法論與本體論），以及前者較後者優越的地位。他一再強調，唯物論者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上帝的信仰」，但這卻無損唯物論者與基督徒在社會革命事業上的合作。唯物論者出於統一戰線的考慮，可以團結與其信仰有根本矛盾的宗教信徒，接受兩者在「末」的層次上合作，但在「本」的範疇上，雙方的矛盾無論如何是無法調和，

39 編者按語：《大學月刊》卷6期2（1947年7月），頁25。

40 吳耀宗：〈一個基督徒的自白——基督教與唯物論〉，《天風》期102（1947年12月27日），頁4-5；又《消息》復期15（1947年12月），頁9-12。顯然，由於《天風》與《消息》均為基督教界刊物，故吳氏在文章標題上作出處理，將「一個基督徒的自白」置前，以突出基督教的主體。

41 李全：〈基督教與唯物論——另外一個基督徒的意見〉，《天風》期106（1948年1月24日），頁4-8。

42 吳耀宗在後來也指「李全」是「教外評論者」。吳耀宗：「我的經歷」，1966年11月4日，手稿，頁27。

43 李全：〈基督教與唯物論——另外一個基督徒的意見〉，頁8。

也不應嘗試調和的。

針對「李全」的觀點，吳耀宗在 1948 年 2 月的《天風》撰文回應。⁴⁴ 他承認，自己對上帝的信仰，在唯物論者眼中，仍然是徹底的「唯心論者」。「如果唯物論把這些東西看作唯心論，則我確是一個道地的唯心論者」。不過，他希望唯物論者明白，他「這種唯心論和唯物論沒有甚麼基本的衝突，因為唯物論所相信的一切，我都可以相信，而我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唯物論的這個否定」。即或如此，他所展現的基督教思想，雖然「和唯物論不完全相同」，但這個宗教信仰，與唯物論一樣，具有同樣的科學性，「因為我所相信的上帝，不是一個憑空推想的上帝，而是從客觀的真理和耶穌基督的啓示體驗得來的上帝」。

吳耀宗相信，他至少已消除了基督教與共產主義間的基本衝突，讓共產主義者明白，基督教雖不是唯物論，但可以接受唯物論的真理，而基督教裏面必需具備的唯心論成分，也不一定與唯物論衝突。但對吳而言，他一直關心的問題，不僅是基本化解兩者的矛盾，而更是提出兩者可以相互補充。

1948 年 7 月，吳耀宗著手修訂《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將原來第一章「聖經中的上帝信仰」重寫，並改為第四章。而「上帝的信仰與唯物論」則從第三章改為第二章。同時，他又將〈基督教與唯物論〉及〈真理可以調和嗎？〉兩文收入為附錄，連同新撰的〈五版序〉，於 1948 年 10 月出版。這時，中國的局勢跟數年前相比，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基督教與戰後中國的前途

吳耀宗就基督教與唯物論的關係所作的思考，絕非抽離於中國社會

44 吳耀宗：〈真理可以調和嗎？——兼答李全先生的〈基督教與唯物論〉〉，《天風》期 108（1948 年 2 月 7 日），頁 7。

的政治現實，以及他對中國基督教在其中應扮演甚麼角色的掙扎。

1945年2月，他在《天風》週刊的「發刊辭」中，表達了對中國的前途的願景：

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正如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世界，是在一個大轉變之中，這轉變的特質，是一切法西斯力量的清算，是政治民主的建立，是經濟民主的推進，是弱小民族的解放，是帝國主義的沒落。……沒有人能夠塞着這一波洪泡，沒有人能夠阻止這一種演變。⁴⁵

在這轉變的過程之中，吳氏希望能將基督教的聲音表達出來，並且發揮「轉移危局，救贖人生」的作用：

基督教對社會生活的基本主張，是自由平等與博愛。這一個主張的基礎就是上帝為父，人類是弟兄的信仰。現代民主主義，大部分是從這種信仰產生出來的，把這一個富有革命性的信仰，應用在中國現在的問題上，使它能夠變成轉移危局，救贖人生的力量，這就是本刊的使命。⁴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告結束。然而，國共兩黨旋即陷入對峙局面，內戰隨時一觸即發。1946年5月，吳耀宗回到上海，《天風》也從成都移至上海復刊。他在「復刊詞」中，闡述其對基督教的使命的理解，就是本着「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向

45 吳耀宗：〈中國的前途——發刊辭〉，《天風》期1（1945年2月10日），頁2。

46 同上，頁4。

現狀挑戰」。他強調「罪惡的勢力，也沒有止境」，因此，基督教要「對每一個時代，每一個集團的罪惡挑戰」，不論這是「舊」或「新」時代，也不管這是「反動」或是「革命」的集團。個別基督徒可以「服膺某種主義」，或從事於某種政治活動，甚至可以參加某個政黨，但他必須知道，其「竭智盡忠的最高對象，卻不是這些東西，而是上帝的真理和他絕對的真善美」。⁴⁷可見，作為基督教界內具批判性的輿論平台，《天風》一直反映出教內自由派及進步基督徒的觀點與立場，⁴⁸自然也受到來自政治及教會界的批評與壓力。

國共內戰初期，吳耀宗仍相信在未來的新時代中，基督教應發揮其批判時代的角色：

我們不要以為舊時代的過去，就是人類一切罪惡的過去；新時代的來臨，就是天國的來臨。社會一切的進步，只是相對的進步，歷史一切的發展，也是相對的發展，新的社會，在某些方面，可能遠遠地超出舊的社會，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的弱點，可能完全消滅，但社會的改造，並不完全等於人心的改造，心靈的改造。社會改造了，人性中罪惡的趨向，仍然會在新的形式，和更高的水準上表現出來。……在未來的新社會，也許沒有大規模的世界戰爭，然而，一個人愛權力愛地位的自我中心的心理，未必就能夠完全消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進步了，人的罪惡傾向，也會水漲船高地同時進步。……一個社會的更新，要與人的心靈的重生，同時並進，天國才能實現。這不是一次社會的改革所能成功，甚至也不是無數次的社會改革所能成功。如果我們以為天國的降臨，是目前的事，只是一個簡單的時代轉變，我們便會陷入

47 吳耀宗：〈基督教的使命——復刊詞〉，《天風》期33（1946年8月10日），頁3。

48 王翔：〈從《天風》看中國激進基督徒的政治表達（1946-1949）〉，《二十一世紀》網絡版，期61（2007年4月），<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703004.pdf>。

幻想，而幻想的結果，便是幻滅。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歡迎時代的轉變，要對時代的轉變寄與無限的期望，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謙卑，要做覺，要永遠提防着像餓獅一般隨時要吃人的魔鬼，也要向着上帝絕對的真、美、善和耶穌純潔無疵的人格，作不斷的追求。⁴⁹

但在兩年後，他儘管仍沒有揚棄基督教的先知批判角色，卻對極可能在新時代中扮演領導地位的中共，抱着更多的諒解。他指出，基督教必須小心，因為其先知聲音無可避免地從慣常的『自由的』思考（“liberal” thinking）出發，不能同情地理解共產政權。他認為，共產黨在進行「改變人類」的艱巨任務（herculean task of “unrooting” humanity）過程中，必然面對內外的敵人。在這情況下，某程度上的警戒、恐懼與懷疑是無可避免的，結果會導致某種「極權式的控制」（totalitarian control）。基督徒一方面要理解這是共產黨在危險環境中為實現目標的非常措施，另一方面又不能因這種同情理解而合理化不同程度的極權式控制。他深信，基督徒面對新政權的底線，就是要捍衛基督徒的人格及自由意志（Christian conception of personality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無論如何，基督教不能失掉的責任，就是在面對侵犯基本人權時，宣講上帝的審判。這些侵犯絕不能被公義及政治需要所合理化。或許教會這樣作要付上代價，但這正是維持教會生活及生命力的唯一方法。⁵⁰

上述的改變，與其解釋為宗教與神學上的調整，倒不如說這反映出吳耀宗在政治立場上再進一步「左傾」。

49 吳耀宗：〈時代的末期〉，《天風》期 39（1946年9月21日），頁6-7。

50 Y. T. Wu, “China Church Faces Crisis,” *Witness* (October 14, 1948): 14.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Ottawa, Canada, MG30 C130, James G. Endicott Fonds, Volume 59 File 1242: Y. T. Wu: Manuscripts and Correspondence, n.d. 1944-1962.

從「第三力量」到擁抱中共

1945年底至1946年初，隨着國共簽訂《雙十協定》⁵¹及政治協商會議⁵²的召開。吳耀宗曾對國共和平建國寄予厚望。但當政協協議無法落實，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吳對國民黨的不滿便愈益增加。⁵³特別是當國民黨不惜以武力及高壓手段來鎮壓民間的爭取民主及反內戰訴求，結果先後發生多起慘案：「昆明血案」（1945年12月1日）⁵⁴、「較場口慘案」（1946年2月10日）⁵⁵、「南通慘案」（1946年3月18日）⁵⁶、「南京下關事件」（1946年6月23日）⁵⁷、「李公樸事件」（1946年7月）⁵⁸、「聞一多事件」

51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從延安飛往重慶，和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雙方簽署了《雙十協定》，同意召開有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出席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蔣介石在會上宣布四項諾言：（一）保證人民自由；（二）各政黨平等；（三）實行地方自治和普選；（四）釋放政治犯。

52 1946年1月政協會議在重慶召開。會議有國民黨代表8人，共產黨代表7人，另有民主黨派代表若干。會議通過了五項決議是《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和《憲法草案案》。

53 吳耀宗：〈和平的途徑〉，《天風》期57（1947年2月1日），頁1-3。

54 1945年11月26日，昆明3萬學生為反內戰和抗議軍警暴行宣布總罷課。12月1日，國民黨軍人分途圍攻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等校，毒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的地方投擲手榴彈，炸死4人，另50多人傷，又稱「一二一慘案」。

55 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特務組織以暴力手段破壞了在重慶較場口舉行的「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多名與會人士被毆傷，又名較場口慘案。

56 1946年3月，國共兩黨和美國三方代表組成軍調小組來到南通。當時，由南通進步青年組成的「文藝協會」向三方代表寫請願書，又舉行反國民黨的示威，要求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內戰。8位青年被國民黨當局秘密逮捕後慘遭殺戮，被捆上石頭拋入長江。又稱「三·一八南通慘案」。

57 參下文。

58 李公樸（1902-1946），上海《讀書生活》創辦人，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44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當選中央執委。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大興街學院坡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1946年7月)⁵⁹、「重慶暴行」(1947年2月)⁶⁰、「二九慘案」(1947年2月9日)⁶¹、「五二〇事件」(1947年5月20日)⁶²，激起更強烈的民憤。其中李、聞兩位批評政府的著名知識分子，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吳在多篇文章內均提及上述事件，⁶³ 這些都是國民黨失去統治合法性，導致民心轉向的重要關鍵。

面對國民黨無情鎮壓學生的反內戰及反獨裁運動，吳耀宗義無反顧地站在學生一邊，甚至無懼國民黨特務的威脅，成為基督教內著名的民主人士。他在政治立場及宗教信仰上的「左傾」表現，無疑使他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1946年3月，吳應華西大學基督教學生團體邀請，作了題為「我的宗教信仰」的演講，其中提及了關於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沒有衝突的觀點。翌日，校園內即出現反對他的標語及口號，「謂余為共產黨工具，歪曲耶穌教義」。⁶⁴ 當時甚至傳出消息，指他將受到不利對待，結果他在「進步同學」安排下，遷至郊外暫避。⁶⁵

59 聞一多(1899-1946)，著名詩人。抗戰期間任教西南聯大，1943年後對國民黨腐敗深表不滿，積極參與反獨裁，爭取民主運動，後參加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暗殺的李公樸的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軍官槍殺。

60 1947年2月5日、8日，重慶國民黨特務襲擊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宣傳隊的慘案。

61 1947年春，在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推動下，上海的永安、先施、新新、國貨等百貨公司職工發起「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並成立「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備委員會」。2月9日，委員會在南京路勤工大樓內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開始後，國民黨特務、暴徒闖入會場，毆打與會人員，破壞場內財物。當場打死永安公司職工梁仁達，打傷參加會議者數十人。

62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地區16所院校學生6,000人在南京組成請願團。遊行隊伍向正在舉行國民參政會的國民大學堂進發時，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

63 參吳耀宗以下發表於《天風》的文章：〈統治者的悲哀〉、〈和平的途徑〉、〈我們的憤怒〉、〈迎接新的時代〉、〈學生運動與目前政局〉，後收入《黑暗與光明》(上海：青年協會，1949)。

64 〈日記摘錄〉、〈日記存稿〉，1946年3月2日；吳耀宗：〈我的經歷〉，1966年11月4日，手稿，頁30。

65 〈日記摘錄〉，1946年3月10日；吳耀宗：〈我的經歷〉，頁30。

1946年5月10日，吳耀宗回到上海後，即積極投入反內戰的民主運動。他與一羣關心時局的基督徒，發起了「中國基督徒民主研究會」，該會的宗旨是「依基督尊重人權之本旨，集合基督教同志，以宗教立場研究民主問題，藉以增進國民對民主之認識，並協助新時代之建設」。⁶⁶此外，他又參加由其他民主人士發起的聚餐會，經常與沈鈞儒、郭沫若、馬敘倫、馬寅初、沈體蘭、史良、章伯鈞、章乃器等人交流。吳氏甚至與張宗麟及沈體蘭等與中共黨員章漢夫、陳家康、華崗作不定期的時局座談。⁶⁷

對吳耀宗而言，1946年的「下關事件」，讓他本人曾親歷國民黨的鎮壓。1946年6月23日，以馬敘倫、雷潔瓊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去南京國民政府、中共及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⁶⁸三方呼籲和平時，在下關火車站被特務襲擊，馬敘倫等均受到嚴重毆傷，史稱「下關事件」。吳耀宗是和平請願的十一人代表團的成員之一，當時眾代表遭特務包圍毒打，吳在危急之際，被人拉到外賓的餐室，才倖免於難。後來，蔣介石拒絕接見代表團，令吳對國民黨更形痛心。⁶⁹相反，鄧穎超卻親自到醫院表達了周恩來的慰問。11月30日，吳又到訪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參加了朱德六十誕辰餐會，並獲周恩來等接待。⁷⁰

面對國共間的政爭及內戰，吳耀宗期望國共以外的「第三力量」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他認為，第三力量一方面可以逼使國民黨減少腐化，

66 〈中國基督徒之和平民主運動〉，《天風》期33（1946年8月10日），頁17-18。其他發起人包括：丁光訓、司徒雷登、梁小初、孫王國秀、涂羽翹、陳文淵、顏惠慶等28人。

67 吳耀宗：〈我的經歷〉，頁32。

68 1945年底至1947年初，剛退役的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奉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之命來華調解國共軍事衝突。

69 吳耀宗：〈下關事件日記一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輯24：「上海解放三十年專輯（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77-78。

70 〈日記摘錄〉，1946年6月26日；吳耀宗：〈我的經歷〉，頁33。

對國事採更開明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可逼使共產黨改變一切過激的作風，「把國家民族永久的利益，放在自己一時利害之上」。⁷¹他表示：「國共雙方都不能把對方的力量消滅」。和談與「相互讓步」是唯一解決辦法。而「第三方面……握有左右時局的力量」，並且可以「逼着共國雙方，找出一條爲人民大眾所擁護的中間道路」。⁷²早於 1944 年，代表「第三力量」的中國民主同盟成立，羅隆基曾邀請吳加入，但爲他所婉拒。⁷³

誠然，國民黨的專橫進一步將吳推向中共。他在 194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學的演講，便嘗試將國共之爭置於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之中：「現在世界上分成兩個陣營，有的左，有的右，當中的人愈來愈少了。」質言之，形勢的發展，使「中間的路線在變化着」。⁷⁴吳所指的變化，即是轉向「左傾」，並與中共建立聯合戰線。對他而言，國共之爭，本質上就是「反民主」與「民主」兩個力量的尖銳對立。⁷⁵

無法迴避的革命挑戰

隨着國共內戰爆發，共產主義業已成爲中國未來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及意識形態，這逼使吳氏作更進一步的反省及探索。

71 吳耀宗：〈中國民主運動的前瞻〉，《民主週刊》期 51-52（1946 年 10 月 10 日），頁 1290-1291、1297。

72 吳耀宗：〈從馬歇爾報告說到中國的現狀〉，《天風》期 56（1947 年 1 月 18 日），頁 3-4。不過，當吳把此文收入 1949 年底出版的《黑暗與光明》時，卻把上述肯定「第三力量」角色的內容刪去。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因為 1947 年時，他並沒有預料到，中共竟能在短短兩年間，就在內戰中取得絕對的優勢。1949 年，昔日對「第三力量」的期望已經變得不合時宜。

73 〈日記摘錄〉，1944 年 6 月 2 日。

74 吳耀宗：〈世界往那裏去〉，原刊於《求是週報》，1947 年 6 月，現參《黑暗與光明》，頁 69。

75 吳耀宗：〈基督教的時代悲劇〉，《天風》期 116（1948 年 4 月 10 日），頁 1-2。

1945年10月，他在〈真理至上〉一文指出，即使「不信仰上帝」的人，也可以「為正義奮鬥，為真理犧牲」。由於上帝是「用真理來表現自己」，「上帝就是真理」，所以「為真理犧牲，就是崇奉上帝，為上帝作見證」。顯然，他所指「不信仰上帝」者，就是共產主義。那麼，基督徒又應如何面對共產主義的「真理」？這實際上已不是個學理的問題，更涉及敏感及複雜的現實政治形勢：

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候，我們敢不敢抱着「真理至上」的精神，摒棄舊的東西，迎接新的東西？如果某一種已經證實了的真理，國人認為是「危險」的，我們敢不敢公斷地接受它？為它宣傳？如果某一種真理，我們以前曾否認它，現在卻被它說服，或者有一種真理，是從一個我們所看不起的人，或者是從我們的敵人的口中說出來的，我們會不會為着「面子」的緣故，而仍然把它拒絕？

吳氏深信，一旦接受了「某種真理」，就「等於站在新舊兩種對壘的力量中的某一方面，就等於有所偏袒，就等於參加了一種鬥爭」。基督徒如果真正抱着「『真理至上』的精神」，就不可能「中立」。甚麼時候基督教會失去了「真理至上」的精神，它就淪為維持現狀的力量。⁷⁶可見，吳耀宗並非停留在理論層面來探索真理，而是在現實歷史中尋找真理，發現上帝。吳氏切實關注的問題是，到底基督教是否願意為真理作見證，並為此付上代價？

1947年8月，吳在英國愛丁堡青年會代表大會的一場討論會，發表題為「基督教與思想的衝突」（Christianity and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的演講，闡釋他如何理解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矛盾。他首先指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明顯較基督教為優勝，因為許多有思想及具社會意

76 吳耀宗：〈真理至上——基督教講話之六〉，《天風》期20（1945年10月22日），頁9-11。

識的青年人，已成為共產主義的信徒。導致共產運動在中國急劇發展的原因，一是國際間的不平等，特別是帝國主義問題；二是社會的不平等，即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而中國的貧窮和飢餓以及政府腐敗和壓迫的統治，也使共產主義號召的「自由、平等、充裕的經濟、沒有階級的社會」變得更具號召力。「共產主義也把它自己當作民主政治的最正確的基礎」。

那麼，基督教應對共產主義持甚麼態度？他說：

從基督教的觀點看來，共產主義無論我們把它當作工作的方法，或生活的哲學，都是有所缺陷的。共產主義所以有所缺陷是因為它的基本哲學——辯證法唯物論，是完全注重相對的事物，那就是變動的事物；而對於絕對的事物，那就是不變的事物，大致是忽略的。因為它過分注重事物的演變，所以它對事物的本體，就沒有有一個具體的概念。因為這個原故，唯物論就必須是無神論。因為有神論相信宇宙間有一位主宰，而這是唯物論所不能想像的。唯物論也有一個危險的傾向，那就是忽略了一個人的本身的價值，而有時把它看作是達到某種社會目的的手段。唯物論的這些缺點；就是造成我們所看見的共產主義制度內許多使人不滿的地方的主要原因。

雖然吳耀宗指出基督教眼中唯物論的不足，但他卻提醒基督徒，「共產主義的種子」，乃根源於社會及國際的不平等，「是在人類不滿足的狀況中生長出來的」。因此，共產主義並不是基督徒的「敵人」，而是「挑戰」。共產主義的發展，充分突顯基督教沒有積極從事消滅社會及國際不平等的「罪惡」。共產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就是：

我們必須對付現在摧殘着人類的兩大罪惡：國際的不平等，和社會的不平等。並且我們必須努力用我們所認為是基督教的方法去對付他們。換句話說，我們在應付這些問題的時候，必須比共產黨做得更好。⁷⁷

可見，1947年期間吳耀宗對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理解，仍沒有離開其原有的思考框架，即兩者互有長短，彼此放下偏見，促進雙方的了解及認識。同時，當他提及基督教比共產黨做得更好時，其實亦隱含着他對基督教的特殊貢獻的堅持。當然，他亦承認，現實上基督教在這方面卻未能發揮貢獻，期待基督教會可以覺悟及變革。吳在1947年曾向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表示：許多教會的優秀學生，冒着被捕的危險，也要跑到解放區。「這是因為，在當前危機中他們在基督徒中間看不到有甚麼好的領導。如果基督徒不來一次強而有力的運動，使他們適應新社會秩序，這些人今後便不會再被教會吸引了」。⁷⁸ 這種對現實基督教的不滿，反映出他思考中深切的危機感。

基督教的危機與悲劇

隨着中國共產革命進程的演進，吳耀宗愈來愈相信，共產主義的成功已證明及徹底暴露了基督教的腐敗與問題，基督教必須深切懺悔認罪。

77 Y. T. Wu, "Christianity and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Plenary Meeting of the World's Committee YMCA's, Edinburgh, August 14, 1947, 1-2. 吳耀宗後來曾撰文介紹此文，並把內容翻譯，參氏著：〈從基督教的觀點看現實〉，《消息》期14（1947年11月），頁5-6。本段引文參吳譯文。後來吳在1949年把此文收入《黑暗與光明》時，刪掉批評共產主義的段落。

78 Mary Austin Endicott, *Five Stars over China: The Story of Our Return to New China* (Toronto: the Author, 1953), 441.

1948年，吳耀宗以中英文撰寫數篇文章，把矛頭指向教會與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關係，同時毫不掩飾地把美國稱為帝國主義國家。

1948年1月7日，他用英文寫成〈悔改的呼籲——基督教信息與中國危機〉(A Call to Repentance: The Christian Message and China's Crisis)，⁷⁹呼籲教會必須在當前世界及中國危機中從速醒覺及悔改，特別是揚棄共產主義是基督教的敵人的想法。他認為當前國民政府企圖在外國援助下以內戰方式來解決中國危機的做法是根本的錯誤，也違反了基督教的原則(un-Christian)。他深信實現和平最大可能的方式，是組成由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這樣才能改變腐敗的現狀，達致公正的社會。基督教在中國未來的命運如何，不僅在於別人對教會的態度，更要看現時教會對新處境所作的貢獻。⁸⁰

未幾，吳耀宗在1948年4月發表引起廣泛爭議的〈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一文，進一步表達有關觀點。全文主要從「世界革命進程」的必然性來檢視基督教在這個大時代中面對的困境。「革命」的主要任務，消極而言是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積極而言，就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平等，沒有階級，共勞共享的新社會」。當前中國的變革，正是革命進程的重要一環，但是中國基督徒除了「逃避現實的消極態度外，似乎就無語可說，無事可做」：

如果我們所宣傳的宗教，只是逃避現實的，個人主義的，奮興式的宗教，那麼，從要求解放的廣大羣眾的眼光看來，基督教也只能是人民的鴉片。時代是要進展的，如果我們的宗教是迷信的，

79 本文暫未見出版，上海市檔案館及加拿大檔案館「文幼章特藏」(Endicott Collections)均藏有打印稿，估計吳氏只傳給其認識的中外友好。Y. T. Wu, "A Call to Repentance: The Christian Message and China's Crisis," January 7, 1948, 上海市檔案館, U 123-0-57. 又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Ottawa, Canada, MG30 C130, James G. Endicott Fonds, Volume 59 File 1242: Y. T. Wu: Manuscripts and Correspondence, n.d. 1944-1962.

80 Y. T. Wu, "A Call to Repentance: The Christian Message and China's Crisis," January 7, 1948, 1-3.

落後的，違反人民利益的，那麼，我們的一切，都將遭受歷史的無情審判與清算。

他認為，基督教所以演變成這個悲劇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對現在的革命運動，是完全沒有了解的」，基督教因着革命運動的消極作用（如暴力與流血），就「幾乎完全否定了這個運動」。但基督教不曉得，革命運動所用的暴力，「正是現行制度中有形無形的暴力的反應與結果」，而革命運動的存在和發展，也正因為基督教沒有盡自己應盡的社會改革任務。抑有進者，基督教又不自覺變成「保守的力量」，與反動的勢力（特別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打成一片。面對這個「歷史的報復」，基督徒「只有傷痛與懺悔」。在文章結束時，吳耀宗總結道：

基督教的歷史悲劇，就在這裏：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它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保守的力量。在目前的世界，它更變成一個反動的力量。基督教在現制度的環境裏，感到溫暖與舒服，因為它的意識和它所宣揚的教義，都是這個環境所孕育出來的。因此，它留戀着這個環境所給予它的特殊的地位和虛幻的自由。但這種種還不足以構成悲劇。悲劇的所以產生卻因為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只把它們自己這個反歷史的計劃，當作福音，向世界宣傳，並且通過金元和軍事的力量，使它與各國的反動力量結合。……在許多的人心目中，美國已經變成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在這個歷史悲劇的進行當中，基督教不但沒有本着先知的精神提出抗議，反而與這個反動的計劃幾乎完全打成一片。這是很可惜的。⁸¹

大約在同一時間，吳耀宗又用英文寫成〈中國教會面對的危機〉

81 吳耀宗：〈基督教的時代悲劇〉，頁 1-4。

(China Church Faces Crisis)，批評中國教會因為受西方教會的影響，對共產主義及革命運動的發展抱極不友善的態度。他回應教會在個別解放區的遭遇的困難，指出問題的關鍵不一定是共產黨企圖消滅宗教，反倒是基督教須負一定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教會與美國這「帝國主義國家」(imperialistic country)的密切關係，令人對教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懷疑。他不得不承認，「不幸的是，考慮到基督徒對共產主義不友善的態度，看來共產黨對部分基督徒的破壞性活動(subversive activities)，並非沒有根據的」。吳氏這篇文章，後來刊登在美國聖公會出版的 *Witness* 上。⁸²

由於吳耀宗所理解的「悲劇」和「危機」不僅指教會在革命進程中淪為保守及反動的力量，更直接把美國形容為「新的帝國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結果其觀點在傳教士圈子引起不少討論，甚至在天風社內，也受到某些傳教士的批評與壓力。據《天風》其中一位編委鄭敬業憶述，有兩位傳教士不滿〈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一文，決定逼令吳氏辭職。⁸³ 天風社的委員間就此展開了大辯論，雖然有人支持吳，但最後由於經濟補助仍仰賴傳教士關係，只能屈從。⁸⁴ 6月19日出版的《天風》，刊登了〈吳耀宗啟事〉，謂「自本刊成立以來，名譽編輯主任一職向由鄙人擔任，茲鄙人已辭去該職，此後僅為編輯委員會委員之一，特此聲明」。⁸⁵ 文幼章亦指出，〈中國教會面對的危機〉一文，「導致耀宗被兩位傳教士逼令在上海辭掉編輯工作」。⁸⁶ 毋庸置疑，辭職風波進一步印證了吳氏對中國教會受帝國主義因素影響的結論。對他而言，基督教除了悔罪改過外，再沒有重生的可能。

82 Y. T. Wu, "China Church Faces Crisis," *Witness* (October 14, 1948): 13-14.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Ottawa, Canada, MG30 C130, James G. Endicott Fonds, Volume 59 File 1242; Y. T. Wu: Manuscripts and Correspondence, n.d. 1944-1962.

83 鄭敬業：〈我敬愛吳耀宗先生〉，《回憶吳耀宗先生》，頁130-131。

84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45。

85 〈吳耀宗啟事〉，《天風》期126（1948年6月19日），頁13。

86 見「文幼章特藏」中〈中國教會面對的危機〉一文上文幼章的親筆字。

投到時代洪流的基督教

中國基督徒應如何悔改？吳耀宗明確指出，基督教不應再持所謂「超然」的態度來回應國共內戰：

他們〔筆者按：基督徒〕自以為是超然的、中立的。如果有人批評國民黨，他們馬上就說：共產黨也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如果有人讚美共產黨，他們就同樣地指出國民黨過去的貢獻和它裏面的優秀人物。對於蘇聯和美國也是一樣。他們以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好或完全壞的，也沒有一個政黨或個人是完全好或完全壞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他們都是有罪的；他們的好壞，只是程度上的差別。這一個「超然」的看法，似乎完全符合基督教的教義，但如果我們把它審查一下，我們就曉得這只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形而上的看法。中國的現狀，就好比一着了火的房子。右邊的一羣人是放火的，左邊的一羣人是救火的。我們站在旁邊的人，如果還有一點人性，就應當毫不遲疑地去參加救火的隊伍。所謂超然者的態度，卻與此相反。他用神學家的眼光，對這個緊急的場面，做一個冷靜的分析，說：放火是不好的，但放火的人未必是完全壞的；救火是好的，但救火的人也未必沒有一點壞處。他自己不去救火，反而把放火和救火兩種行動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使善惡的評判，變成毫無意義。這種態度表面上似乎「公正」，其實是虛偽而殘忍的。

基督徒唯一的出路，就是「投身到時代的洪流裏去，與它合作，去完成時代的使命」。吳強調，這樣做並非「『迎合』潮流」。既然「這

個潮流是對的」，基督教就得主動「贊成這個潮流的總的方向」。⁸⁷

那麼，到底何謂時代的潮流？就是沒有階級的社會。要實現這目標，把中國社會從「壓迫與殘暴」和「根深蒂固的反動力量統治」中「翻身」和「解放」，吳耀宗相信，「就不能完全避免革命的手段」。這對向來反對「以暴易暴」，高舉基督教愛的教訓，甚至信奉「唯愛」主義的基督徒而言，確是很大的挑戰。但吳指出：

當我們反對別人使用革命手段去改造社會的時候，我們自己並沒有指出一種更好的辦法，而結果就等於我們主張維持現狀，那就是說，維持現社會裏已經存在着的許多有形無形的暴力，讓人民痛苦下去。我們標榜着絕對的愛。然而，我們沒有實行這個絕對的愛。我們甚至沒有實行相對的愛，因為相對的愛是講公道的，是不拒絕以相對的手段去追求絕對的目標的。⁸⁸

事實上，吳耀宗這時業已全身投入時代浪潮之中，1949年1月，中共中央邀請他北上商討基督教的問題。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精密部署下，中共自1948年9月起，已分批把民主及文化界人士從香港運送至解放區，為即將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作準備。2月中，吳耀宗從香港經北朝鮮到了安東、瀋陽，3月19日，吳抵達北平。⁸⁹3月22日，李維漢與吳耀宗面談，解釋了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吳表示完全同意。⁹⁰3月25日，毛澤東更在西苑接見了包括吳耀宗在內的一批人士。⁹¹在北平期間，吳與

87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續）〉，頁4。

88 同上，頁3。

89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天風》期176（1949年8月20日），頁3。

90 李勇、張仲田編著：《統一戰線大事記——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卷》（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頁553。

91 吳耀宗：〈我的經歷〉，頁39。

當局商討基督教的具體問題。⁹² 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的籌備會在北平召開，確立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其中宗教界佔有八席（七個正式，一個候補），吳耀宗也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後，吳耀宗由北平抵達已解放的上海，並向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執委會報告在北平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情況，特別是傳達新政權對基督教的期望。⁹³ 這時，吳成爲基督教界與中共間的中介，後來新政協的基督教界代表名單，也是由他以基督教聯絡人員身分，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⁹⁴ 9月召開的新政協會議，吳氏更以「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身分發言。⁹⁵

在吳耀宗眼中，既然中共願意提出新民主主義路線，爲日後向社會主義過渡作預備，基督教方面也應作出配合。而這種調整與配合，實際上亦不違反基督教的精神：

政協所通過的共同綱領，是目前中國革命的最低綱領。基督教也有低和高的綱領，高的是愛人如己，低的是投身時代洪流。這低的和政府所推行的是完全一致的。⁹⁶

92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頁3。另〈北行感想〉，《新聞日報》，1949年7月1日。

93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of the N.C.C.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23 June 1949,” *China Bulletin* 62 (August 24, 1949), 1-2.

94 〈新政協會議基督教代表〉，《天風》期180（1949年9月17日），頁12。五位代表是：吳耀宗、鄧裕志（女青年協會幹事）、趙紫宸（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劉良模（前青年協會幹事）、張雪岩（田家半月刊社長）。趙紫宸、鄧裕志、吳耀宗、張雪岩、劉良模：〈我們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經過〉，《天風》期182（1949年10月1日），頁8-9。

95 〈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吳耀宗發言〉，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秘書處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刊》（北京：新華書店，1950），頁299。吳氏發言亦收入《黑暗與光明》，頁275-276。

96 〈吳耀宗先生在本屆義務工作會議上靈修的講詞〉，《上海青年》卷49期4（1949年12月），頁4。

吳耀宗並不認為上述的主張是「調和」或「投降」，反倒是「融會貫通」，「與潮流同行，真理得以益彰」。⁹⁷ 對吳耀宗而言，共產主義的實踐，自然比基督教為優勝。因此，基督教在當下的實踐，就是「投身時代洪流之中」，爭取進一步改造自身的機會，讓基督教可以在「此時此地建設的工作上」作「充分的貢獻」。⁹⁸

基督教的改造

雖然吳耀宗強調，基督教要堅持底線，批判新時代或潮流的錯失，但他面對的兩難正是：現實的基督教是否具備這種批判的能力？早於1947年，他曾對文幼章說：「我們必須把寄託於遙遠未來的理想，轉化成為事實」，改造中國教會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變革中的中國社會。⁹⁹ 吳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讓腐敗的基督教重生。上海解放後，他於1949年7月在《大公報》發表的〈基督教的改造〉一文，便充分反映其立場與關注。

為何基督教對革命採取模糊與冷漠的態度？關鍵的原因在於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吳承認，「帝國主義者的確是利用了宗教來做『侵略』、『剝削』、『欺騙』、『愚化』中國人民的工具」。雖然西方傳教士及差會「也許完全沒有這樣的企圖」，但基督教的英美背景，使其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制度及環境的影響。這便解釋了為何美國一些著名的基督教學者，沒有抗議美國「侵略的外交政策」，「反而做了這種政策的辯護者和代言人」。「中國的教會在現階

97 何慈洪、黃佑雲筆記：〈基督教文字工作路線問題——由繆秋笙、吳耀宗兩人介紹〉，《天風》期174（1949年8月6日），頁4。

98 〈吳耀宗先生在本屆義務工作會議上靈修的講詞〉，《上海青年》卷49期4（1949年12月），頁4。

99 Endicott, *Five Stars over China*, 441.

段中，雖然在名義上是獨立的，但實際上還沒有脫離西國差會直接間接的影響與控制。」¹⁰⁰

此外，基督教的個人主義傾向亦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它所宣傳的福音，大部分已經不是耶穌解放人類的革命福音，而只是帶着麻醉性的個人得救的「福音」，或者是給資產階級和有閒階級一點感情上溫暖與安慰的錦上添花的「福音」。這個「福音」已經脫離勞苦大眾，脫離目前世界在洪爐中被試煉的現實。它不能給痛苦的人類指示一條出路；即使它做著一些服務慈善的工作，那也不過是頭痛醫頭的改良主義的辦法，對於世界基本的變革，沒有多少幫助。

由於中國教會自身的缺點，導致基督教的福音失去原有的革命救世力量。不僅如此，更「違反了、出賣了」這個「革命的福音」。因此，中國基督教會必須「改轍易轍、懺悔更生」，否則就會被時代的潮流所淘汰。¹⁰¹而改造基督教的大原則就是：「基督教必須把自己從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系統中掙扎出來擺脫出來」，並且進一步實行「自立自養自傳」的原則，整個過程是痛苦的，但「這個死亡正是它的新生」。¹⁰²

吳耀宗呼籲中國教會要「認識現在的時代，和它自己過去的歷史」。基督教在中國固然有「光明」的一方面：「它是現代文明和舊式民主主義的孕育者；它是社會事業的先導，人道主義的泉源」，但也不能否認其「黑暗的方面」：包括迷信、腐敗、勢利、殘暴及與統治者的勾結。「面

100 吳耀宗：〈基督教的改造〉，原刊於《大公報》，1949年7月16日至18日。另《天風》期173（1949年7月30日），頁8。

101 同上，頁8。

102 同上，頁9。

對着這個歷史，它應當懺悔，應當嚴厲地自我批評」，並認識現在的時代：

現在的時代是人民解放的時代，是舊制度崩潰的時代，同時也應當是基督教除舊佈新的時代。基督教必須知道：它自己已經重新把耶穌釘在十字架，重新用送葬的衣服，把他緊緊地裹紮起來。基督教必須知道：它已經不是醫治世界痛苦的萬靈藥的專賣者，相反地，上帝已經把人類得救的鑰匙，從它的手中奪去，給了別人。總一句話說，基督教必須大徹大悟，讓舊的軀殼死去，讓新的生命來臨。¹⁰³

質言之，中國革命的成功，宣告了現實的基督教的失敗，並且對後者帶來嚴厲的審判。抑有進者，中國革命的成功，更反映出上帝對基督教的極度失望，因而主動棄絕基督教，把「人類得救的鑰匙」交給「別人」。這裏所指的「別人」，無疑就是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基督教的獨特貢獻？

隨着東北、平津及上海等地先後「解放」，也意味着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優勢已徹底崩潰，中共「解放」全國只是時間的問題。吳耀宗在1949年中，已公開宣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¹⁰⁴ 新中國成立後，他興奮地宣告：

103 同上，頁9。

104 吳耀宗：〈從「七一」到「七七」〉，原刊《解放日報》，1949年7月7日，收入《黑暗與光明》，頁227。

現在，帝國主義的力量，被驅逐出中國境外了；封建的統治，被人民的武力完全打跨了。從今以後，中國的民族不再是一個被壓迫，被欺侮的民族。的確，舊中國死亡了，新中國誕生了。¹⁰⁵

吳耀宗跟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熱切地相信，中國已告別「黑暗」的舊時代，並期待新中國帶來的「光明」。1949年12月及1950年4月，他將四十年代部分文章結集，分別取名《黑暗與光明》及《基督教講話》，由青年協會出版。

面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與「成就」，他又如何理解新時代中基督教的貢獻？

打從三十年代以還，吳耀宗在探討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時，雖然對共產主義的理想與實踐有愈來愈多的認同，對基督教的現實有愈來愈多的失望，但由於他仍相信基督教的理想，因此，基督教的獨特貢獻在其思想中，仍具有頗重要的位置。然而，隨着中國革命的實現，他對基督教的獨特貢獻的理解，卻不是從本身的「獨殊性」來闡釋，而是藉着其與中國革命潮流的結合來確認。他充分明白這見解衍生的問題，就是「如果我們投身到時代的洪流裏去，這豈不是叫基督徒與別的人毫無分別？」但他卻認為，這種反應是「一個錯誤的見解」。因為「基督教特殊的貢獻」，並不代表「基督教所做的事，必須與眾不同」。正如耶穌要求信徒「做麵酵，做光，做鹽」，「他沒有叫我們創造另一個世界，而是叫我們在現世界裏，發生救世化人的作用」。¹⁰⁶

1949年6月4日，吳耀宗在北平女青年會舉行的華北基督教領袖進修會上的講題，亦涉及了基督教的貢獻。他認為，在討論基督教對「新民主社會」的貢獻前，更重要的，是「認識基督教過去的保守成份及無

105 吳耀宗：〈新中國的誕生〉，《天風》期194（1949年12月24日），頁6。

106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續）〉，頁4。

知成份，深自懺悔，求上帝把我們從無知及自私中解放出來」。同時，基督徒必須看見及認識到，「現代歷史的主流是人民的解放，被壓迫者的翻身」。這跟聖經所說的「在高的將要降低」、「在後的必要在前」、「不平的都要填平」是一致的。他進一步指出：

假如這種潮流是不對的，基督教就應做中流砥柱去反對它，但現在這潮流是對的，人民的呼聲就是上帝的呼聲，因此，基督教就要投身於這個潮流，幫忙它走一個更正確更合乎上帝旨意的方向……所以現在不是要問基督教有甚麼特殊的供〔貢〕獻，我們基督教徒常常自以為是特殊的，連吃飯走路似乎也與人不同，現在不是講甚麼特殊的供〔貢〕獻，而是投身到洪流與別人一同努力，並且比別人做得更好更完善。……現在的問題不在乎政府對基督教取甚麼態度，而是在乎基督教怎樣自處；也不是在我們做了甚麼「特殊」的工作，而只是在我們對新民主社會有甚麼貢獻。¹⁰⁷

當吳耀宗一方面把時代潮流等同真理，把人民的呼聲等同上帝的呼聲，另一方面又批判現實的基督教的腐敗與失敗時，他便無可避免地擱置了關於基督教批判新時代的主張。他指出，許多基督教學者強調「人性中惡的因素」及「人類進步的相對性」，結果導致「對社會革命表示懷疑和冷淡的態度，甚至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他堅決反對這種「錯誤」及「充滿了麻醉性」的思想。

我們要用我們全副的力量，去爭取每一個可能的進步；我們相信：在任何的時代中，人類都具有充分的力量去驅逐黑暗，迎接光明。¹⁰⁸

107 吳耀宗：〈基督教對於民主社會之貢獻〉，《田家》卷16期1（1949年8月），頁9。

108 吳耀宗：〈序〉，《黑暗與光明》，頁2-3。

由於中國革命的進步性，基督教在新中國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帶着懺悔的心，改造自我，投入革命洪流。

總結

綜觀 1942 至 1949 年間吳耀宗的宗教思想及行動實踐，可以分成兩個階段，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更是貫徹整個時期的中心脈絡：

(一) 1942 至 1945 年：隨着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密切影響了中日戰爭的形勢。此時吳耀宗廝身「大後方」，主要負責基督教聯合出版社的工作，期間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全書總結了他自三十年代以降對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問題的探索，並建立了調和兩者的理論框架。期間，由於積極投入抗日運動，他跟中共間也發展了進一步的關係，也成為中共基督教界重點的統戰對象。

(二) 1945 至 1949 年：中國的局勢並未隨抗戰勝利而邁向光明，國共內戰再令國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神學思想方面，吳耀宗仍承繼《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的主張，沒有放棄調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努力。他深信，兩者之間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點，餘下差異就是對「上帝的信仰」。在調和論背後，可見吳仍堅持基督教信仰的獨特貢獻，可以補共產主義的不足。

在行動實踐方面，由於積極投身反內戰運動，吳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意益強烈。他曾期望國、共與「第三力量」間，可以衷誠團結，攜手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但隨着內戰期間的民心轉向，中共成功吸納了反國民黨的民主力量，吳耀宗的政治立場也進一步左傾，加入了擁護中

共的民主人士行列。而他對基督教信仰在中國社會重建的過程中的角色，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重要的調整。一方面，他面對的「真理」，已不再是理念層面的共產主義，成為現實政治層面的中共；另一方面，他對現實的基督教也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基督教成為跟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打成一片的腐敗勢力。於是，儘管他仍沒有揚棄調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兩者，但現實的基督教會已失去其革命精神，而中共領導的革命也成為上帝在歷史現實中彰顯的真理。在中共建國前夕，吳耀宗已旗幟鮮明地站在時代革命的洪流之中，並呼籲中國基督教必須醒覺過來。

吳耀宗懷着對革命的憧憬，以及革新基督教和調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熱誠，迎向新中國的誕生。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凡例

- (一) 本卷因篇幅關係，分上下兩冊，上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吳耀宗於 1942 至 1949 年間發表的中英文文章，一律以文章出版的年月為次序編排；第二部收入吳耀宗為其他書籍撰寫的序言與後記；第三部分是他曾聯署的聲明；下冊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 1942 至 1949 年間出版的文集及專著；第二部分為未刊文稿，包括其他未刊文章，及 1942 至 1949 年間的「日記存稿」及「日記摘錄」。
- (二) 部分文章後來刊載於其他刊物，如內容並無重大修改，悉以首刊版本為準，並於註釋內說明其他出處；如選用非首刊版本，亦會在註釋內說明。
- (三) 《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的最早版本，是刊於 1943 年 11 月《基督教叢刊》內近五萬多字的長文。後來由成都的基督教聯合出版社以單行本形式發行了兩次。戰後復員，吳耀宗回到上海後，又由青年協會書局出版第四版，收入「青年叢書」第二集第二十二種，內文沒有修改，只增加了吳撰的〈四版序〉，於 1946 年 12 月出版。1948 年 10 月，吳針對內容作出較重大的修改，是為《沒有人看見過上帝》一書的第五版，除新撰的〈五版序〉外，又收入兩篇文章作附錄。本卷以第五版為本，再對比不同版本，在內文或以註釋說明修改地方。

- (四) 部分文章刊出後再收入吳耀宗的自選文集《黑暗與光明》(1949年出版)及《基督教講話》(1950年出版)。其中《黑暗與光明》部分文章，曾作較重大的修改，有關增刪內容會在註釋中說明。另《黑暗與光明》的「補篇」，收錄了1939至1942年間出版的六篇文章。考慮到這六篇文章反映的思想趨向及關注課題，故分別收入卷二上冊及卷三上冊內。此外，由於《基督教講話》各文章主要反映吳氏在國共內戰前期(1945至1947年)的思想，故將各文章維持收錄於卷三上冊內。《基督教講話》版更正了個別誤植字，今據此版。
- (五) 1942至1949年間，吳耀宗曾與劉開榮合譯一部著作——夏爾孟(Henry B. Sharman)編《為人師的耶穌》(*Jesus as Teacher*) (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本卷只收入吳撰的序言，其餘內容從略。
- (六) 部分文章以「叔海」為筆名發表。
- (七) 所有用字、遣辭、標點，皆依原文，除少數確認為錯訛及誤植文字會作訂正外，悉保持原文。